

经济计划工作的趋势

毛蕴诗

宏观经济计划是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如印度、法国、日本等都设有庞大的中央计划机构，负责制订全国性的经济发展计划。虽然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在目的、范围和起作用的方式上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考察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实践，可以概括如下具有趋向性的特点。

一、对经济发展多目标的强调

许多国家，包括我国，过去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强调主要着重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产品总量上。现在经济管理机构 and 决策层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给予其它发展目标和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在：重视经济的各部分的协调，重视对合理经济结构的引导，重视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耗竭等。从国内外情况均可看到这一趋势。

我国的经济工作在“六五”期间实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变。这些转变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上，从片面的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在对外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开始转向积极进行国际交往的开放型经济。

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第八个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1991—2000年）规划（以后简称“十年规划”），进一步体现了对于经济发展的多目标的强调。例如，“七五”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促进科技和智力开发。其次，计划目标体现了把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具体为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并强调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我国“十年规划”的总目标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1）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按不变价格计算），提高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2）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3）发展教育、科技，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4）初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5）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建立。^①

“1982年以前，我国制订的计划叫国民经济计划，随着计划内容的增加，从1982年开始，将国民经济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②

从国外情况看，前苏联自1978年起把国民经济计划改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

社会发展问题，如劳动条件、环境保护、社会福利设施、住宅建筑和职业教育等，明确地列为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和日本都是具有一整套中央经济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第四个中期计划（1961—1965年），开始增加了社会与地区发展的内容，把领土整治与社会问题列入国家计划中，以缩小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其第九个五年计划（1984—1988年），又将文化的发展纳入国家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法国现代化，保证法国的主权，实现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距等。

应当清醒地看到，提出经济发展目标是一回事，目标能否实现，或者是否采取措施保证其实现又是一回事。例如，由于不可能触及社会制度本身，西方国家和一些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失业救济、社会救济等，但不能解决问题，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个极端是少数人越来越富，另一极端是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国家所提出的某些目标不过是摆样子，作宣传而已。

也应看到，许多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目标甚至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在西方国家中，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之间往往就存在不一致。这种两难的情形，往往需要在一定范围下作出选择，或采取补救措施。

二、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强调

对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重视是同对经济发展多目标的重视相一致的。因为增长以外的经济发展目标，更多地要靠经济政策的实施来实现。战略与政策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与方向，并对所需用的资源作出部署。因此，战略与政策实际上为计划提供了框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等由于制订了有效的发展战略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考虑都使得经济决策层次更加重视战略和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实际上使得战略成为长期计划中的最重要部分。

近年来，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我国受到很大重视，开展了许多关于全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我国最近制定的“八五”计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1991—2000年）规划，就是从实现本世纪末战略目标的要求出发制定的。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在“七五”计划的过程中。例如，在“七五”计划执行过程中，国务院于1989年3月18日颁布了我国第一个产业政策：“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制定“七五”计划的过程中，没有过多地强调数值性指标，没有列很多数字，除了强调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之外，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这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也进一步体现了上述转变。“除了提出少数重要指标外，着重是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基本任务和重大方针政策。”^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八五”计划中以很大篇幅阐述了“主要经济部门的任务和政策”。

美国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发展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不是数字而是政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上——这些政策将刺激整个经济向前运动。”^④

对政策重视的另一特点是对执行政策的强调。因为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也因为有的政策执行中可能会产生派生影响。实际上，政策能否产生预期作用的关键在于政策能否顺利实施，能否按预期方式实施。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似乎做得较好。例如，日本

政府1987年颁发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第4章为“实施计划所需的主要政策措施”，第6章为“有效地推进计划”，该两章就占去整个计划篇幅的一半以上。

三、对中长期经济计划的重视

计划的中长期是指2—10年的范围。许多国家都越来越强调中长期计划的作用，强调提高这些计划的科学性和编制质量。因而也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以中长期为其计划期的计划形式。

我国自1953年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以来，一直以5年计划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但是本世纪最后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因此，在制定第八个五年（1991—1995年）计划的同时，首次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1991—2000年）规划。”这样就把十年远景规划与五年中期安排结合起来。日本的经济计划一般以5—7年为其计划期，个别也为10年，如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就是一个精心编制的中长期计划。在欧洲情况也是如此，法国、瑞典、波兰、匈牙利、前苏联等国都强调中长期计划的作用。在前苏联，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形式。而在法国，为了提高中期计划的质量，在执行第六个计划（1971—1975）的过程中，实行了向中期经济模型体系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综合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更多的有关模型，以提供更详细的中期预测。

刘易斯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他认为5年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期，虽然它并不比3年、4年或6年、7年绝对优越，这些也是颇受欢迎的数字。理论上很难说谁好。^⑤

对长期计划的重视是以短期和长期计划相比较而言的。就长期计划来说，它涉及的期限太长，未来的经济环境与技术状况变化可能很大，所以涉及的不肯定因素多。许多长期计划，往往至多只能起参考作用。一般对长期计划的强调是在发展战略的研究上。

另一方面，对于短期计划来说，主要是执行问题。由于不涉及一年以后的事情，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有限。年内的许多问题也已明朗化，即使调整改变计划，意义已不大。对于中期计划来说，它更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有效影响和指导作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它介于长期经济计划与短期经济计划之间，既不致于充满那么多的不肯定因素以致使人难以相信，也不致于因期限过短而刻板得没有一点弹性。

其次，中期计划对于处理不肯定的情况较为有利。实践中的中期预测也较为成功，从而提高中期计划的质量。

最后，中期计划也是许多重大投资项目、重大技术改造从实施到完工并产生经济效益的时期。这些工程和项目的投产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四、对现代计划技术和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重视

强调计划要有科学的依据促进了现代计划方法与技术的迅速发展。近5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逐步信息化以及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向经济管理领域渗透，计划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其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把计划方法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传统方法（早期）阶段，（2）传统方法与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应用相结合阶段，（3）全国经济信息系统建立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中，相继研究、开发并验证和确立了多种以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的重要计划方法，如（1）图表平衡法，（2）经验分析法，（3）弹性分析法，（4）投资决策分析方法，

(5) 经济增长模型法, (6) 生产函数分析法, (7) 经济计量方法, (8) 投入产出分析法, (9) 优化方法, (10) 系统模拟等。其中, 许多先进和复杂方法的开发是以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支持的。计算机技术的进展使得一些方法的实际应用成为可能, 如优化方法、投入产出法、经济计量方法等。事实上, 今天的许多计划工作离开了计算机就无法进行。例如用IBM 360/150型计算机求解一个72行500列的线性规划问题只需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如用人工计算,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各大类计划方法, 如同单个的某种工具一样, 一般只能于某些工作, 用于一定的范围, 从而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正如找不到一种万能工具一样, 也不存在一种适用于各种计划工作目的的计划方法。但是多种工具结合在一起使用, 就可能解决某一复杂过程所需的手段。在实际计划工作过程中, 几乎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 这是计划工作的又一重要特点和趋势。例如, 先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估计部门最终需求, 再据此利用投入产出模型, 来估计部门总产出, 并进而估计部门投入产出流量, 编制计划期投入产出表。这种做法已在许多国家的计划工作中得到应用。例如, 匈牙利的M4模型, 美国的DRI (Data Resources Inc) 模型、沃顿模型都是如此。克莱因提到“我们用作10年预测的长期沃顿模型甚而把完整的投入产出体系与确定收入和支出流量的详细关系结合起来”。^⑥此外, 投入产出法与优化方法的综合运用, 经济增长模型、经济计量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建立宏观经济优化模型; 可以保证总量与部分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这些在许多国家付诸了实践, 在我国也开始受到重视。

五、对计划程序的高度重视

对计划制定程序的重视是现代经济计划工作的又一特点。程序实际上是一种行事、做工作的方式。计划程序规定了系统地提出和制定计划的准确方式。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计划工作都遵循一定的程序, 有的甚至是由立法所规定的程序。在实践中, 从制订宏观经济计划, 制订发展战略, 到制订一般的项目计划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进行。例如, 在我国“八五”计划编制中, 不少专家学者建议采用“两下一上”的计划编制程序, 即由中央先下达指导思想、政策纲要和控制指标, 再由地方上报计划草案, 然后由中央下达国家计划。又如, 法国、日本因其计划特点的不同, 也都有一套较为固定的计划制订程序。遵循科学的计划程序能保证计划的科学性和提高计划的质量, 防止计划的随意性, 从而减少因决策不当造成失误。计划程序涉及计划工作制度问题, 在我国尚不健全。主要问题包括, 计划编制、执行、修改调整中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尚需进一步明确。为此许多专家呼吁加快计划程序立法。

六、强调从多个备择方案中进行选择

理想的计划是使经济活动最优化的计划。但是计划工作存在诸多困难, 由于许多经济活动本身极其复杂, 也由于各种计划技术都有其局限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 直接提出最优方案是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 现代计划工作强调提出多个备择方案, 以便从中评选合适的方案, 这对于提高计划的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例如,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创造人—美国的瓦西里·列昂节夫教授认为: “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作挑选, 是制订国内经济计划的关键。制定计划过程不应从理论经济学家提出的作为普遍的“目标数函”公式入手, 而应从认真挑选可供选择的方案着手, 这些方案的每一个都是用具体的非技术性语言说明将来经济的各种可能情况的一种。”^⑦ (下转第26页)

多少。因此人们难以经常做到行为最优化，例如我们买东西时总是上当受骗或后悔遗憾，再如两人因小事而争气斗狠。所以经济方法以理性原则为前提，就不能很好解释上述非理性行为。其二是，这种分析以成本—收益比较为基本方法，成本—收益比较要求能确切计算活动中招致的各项成本和得到的种种收益，但在非经济活动中，收益—成本被广义化为得—失，而得—失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物质方面的得失可确切计算，但精神方面的得失则基本上取决于主观心理评价，既难于确切计算，又缺乏统一标准。因此，成本—收益比较难以胜任对非经济活动的分析，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强行把人类活动的精神方面物质化而纳入成本—收益体系中，就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既不能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难以对人类行为的变化进行有效的预测。其三是，这种分析假定人们总是利己与自私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犯了根本错误。一方面，人的自私本性与利己主义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私有制社会固然是如此，但在公有制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则有了根本转变，出现了很多大公无私的现象，而西方经济学则狭隘地把自私与利己永恒化了。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自私与利己也只是人们行为的一个方面，各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还有着无私的奉献、高尚的爱心、以及美好的精神追求与向往，尽管有些属于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范畴，但毕竟不只是利己与自私。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又把利己与自私绝对化了。西方经济学也意识到这诸多例外，从而重新解释了利己与自私，但这种解释却太过牵强。因此，经济方法只能部分地解释部分非经济现象和行为，只能说，经济方法“分析人们行为的科学洞察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杰出的，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们作为有用知识在某一绝对级别方面排在很前，不如说是因为它们道出了一些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知道的事情。总之应让这些洞察力总处于发展中，它们多半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而只是表述了我们目前理解世界所尝试的一种方法。”^⑥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我们还必须借助于其它社会科学。

注释：

①弗朗克·奈特：《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局限》，载《竞争伦理学及其它论文集》，哈钦和罗出版公司，1935年版，第105页。②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③罗伯特·J·奥曼：《对策论试图做到什么》载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尖端》，巴塞尔·布莱克威尔公司，1985年版，第35页。④贝克尔：《用经济方法探讨人类行为》，转引自《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6—7页。⑤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⑥戈登·图洛克和理查德·麦肯齐：《经济学的新世界》，理查德·D·欧文公司，1985年版，第23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

(上接第7页)

在我国实际计划工作中，制订多种备择方案，已受到重视并广为应用。一些部门甚至规定，在没有备择方案的情况下不进行决策。

了解国内外经济计划工作的趋势，借鉴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无疑有助于提高计划工作的质量，使计划工作更有成效，使计划更具有科学性。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改革，对于当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探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91年4月16日。

②杨方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第5页。

④⑤(美)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1、144页。

⑥(美)劳伦斯·克莱因、理查德·扬著：《经济计量预测与预测模型入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47页。

⑦参见瓦西里·列昂节夫著：《经济论文》，交易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98—406页。

(责任编辑 徐云鹏)